第一章　政治社会学的历史演变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的孕育

一、传统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知识成份

政治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政治生活加以观察、分析与概括。在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思想家孔德正式创立社会学之前，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只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其他较早形成的学科之中，因此，对政治生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种种尝试也往往是在其他学科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化还不太明显。人类的理性还习惯于将整个客观社会视为是一个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整体。对这种整体作宏观的、抽象的把握的种种探索与尝试，使得哲学成为最早的知识门类。在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变化、发展加以分析与概括时，许多思想家不得不去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在现代哲学产生以前的传统哲学中，政治哲学自然成为一种“显学”。

由于将政治纳入哲学考察的对象，政治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内容。一些对政治生活的存在及其发展的条件作分析的政治哲学家则从社会的经济、文化等角度对政治作出说明。这种知识就构成了最初的政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社会学的萌芽。

当时，政治学还包裹在“哲学”的外衣之中，过分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使得政治学缺乏与社会真实政治生活的联系。政治学的这种“哲学”束缚必然影响对政治生活作出的社会分析。因此，传统政治学时期在知识的宝库中所沉积下来的政治社会学的成份是不清晰的，它的某些意义常常是在政治社会学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以后，人们追溯其历史线索时才得到揭示与理解的。

在传统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对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作出较多论述的中外思想家主要有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黑格尔；孔子、墨子、老子；等等。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 年一公元前 322 年）之前，柏拉图建立了政治哲学体系。他以理念为知识的标准和根据，通过抽象的概括与演绎，构想出一套“共和国”的理想结构。柏拉图从人性假设出发，提出社会等级观念，并论证了社会的统治权应归于“哲学王”的命题。柏拉图的这套理论虽然肤浅与可笑，但是，他终究是站立在现实的土地上来构思他的“天方夜谭”的，他有时也会不自觉地、偶然地得出某些真实的结论。比如在谈到理想的城邦建构时，他提出应当考虑地理条件与人口因素，政治生活与社会分工及社会规范道德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得意的学生。但是，他并没有墨守老师的说教，而是摒弃了基于先天理念的概括与演绎法，创立了基于客观政治生活的比较方法与归纳方法。亚里士多德

对古希腊的 158 个城邦作了细心的考察，分析了它们的法律条文与政权结构方式，并对城邦的政治体制作了分类，从而建立了最早的比较政治分析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考察了在古希腊半岛上实际存在的经济制度，他从当时的经济事实中，分析了人们物物交换的集市行为，并研究了货币产生的必然性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他从人是政治动物的假设出发，研究了政治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亚里士多德所写的《政治学》，很多是阐述政治社会学的内容。但是，由于他还只能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上来观察和描述政治，他所涉及到的政治社会学知识也必然带有抽象的性质。他的贡献在于奠定了对社会政治生活作研究的依据事实与经验的实证方法和科学态度。

三、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社会观点

有人说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 年—1527 年）已脱离政治哲学成为近代政治学家，但实际上，他只是朝向近代政治学前进的人，政治哲学并没有到他那里终结。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一直延续到黑格尔那里。但是，马基雅维利的确是一个与传统政治哲学家不同的人。在他的名著《君主》中，他确立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正确的研究方法。

马基雅维利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学家奥古斯丁不同，他正好生活于欧洲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一方面，教权和传统的大帝国已经走向没落，封建制度在走过了它的全盛阶段后正趋于瓦解；另一方面，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为首的近代民族国家，正处在形成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

利将政治学首先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神学牢笼中拉出来，然后又与形而上学和宗教相对抗，将政治学确定为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更具体一点讲就是阐述国家权力的取得、扩大、保持、消失的知识。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政治行为中充斥的是人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建立法律与政府。现实的人在才智方面是不平等的，因此，政治的重要问题是如何领导人与利用人。政治是基础是领土与财富，因此，强权就是公理，一切都必须以国家的实际利益作为政治行动的前提，为达到国家强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政治关注的是其目标与目的，为达到实际的利益，道德伦理应当加以排除。

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创立了一门国家政治权力的病理学与解剖学，他将国家看成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并把它视作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物。马基雅维利把政治研究的科学性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向前推进了，并把政治归结为国家政权的运行过程，从而更为鲜明地突出政治的社会前提与社会意义。

四、孟德斯鸠的政治社会研究

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研究态度在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那里得到发扬光大。其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rdat Montesquieu，1689 年—1755 年）。他反对以理性为依据的研究方法，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直接观察。他提出应绝对禁忌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入手，而应该从事物本身的性质去寻求原理或原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研究者必须从其政治体制、宗教、气候、人口等等因素以及历史的传统等

方面去寻找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法则”。

孟德斯鸠还认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研究要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他指出，政治学家对于政治事物，应当坚持“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应当去推测“应当是什么”。这是把政治学研究中的事实判断同其道德价值判断相分割的最初尝试。

孟德斯鸠坚持把社会政治现象即国家看作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结构整体。在国家的共同体中，有许多的复杂成份，这些成份都会通过国家的立法、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体现出来。这些存在的机构或规范，都是统一的国家整体的表象或反射。如果仅仅从个别的政治事件、机构入手去分析、判断，则不可能真正了解国家的本质。反过来，从整体、从综合的观点去衡量某些政治现象，则能找到其发生的原因。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一直到孟德斯鸠，虽然都未离开传统政治学的范围，但是，他们却不断突破政治哲学的束缚，从理性主义走向客观、实证的分析。政治哲学的抽象的因素越少，经验的、事实的分析的成份就越多。这就导致政治哲学向现代科学的政治学发展。另一方面，在对政治生活作更多的经验层次的、事实层次的研究与说明时，对政治分析的社会学视野也就变得更为广阔与清晰，这就导致一门新的学科即社会学的产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的萌发

一、社会学中的政治社会学知识门类

通常人们都把 19 世纪称为社会学的时代，其原因是在 19 世纪初，一些思想家在著述中表达出明显的社会学倾向，而到 30 年代，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 年—1857 年）则正式提出了“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并规定了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其后，社会学便在欧洲大陆和北美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门“显学”。

19 世纪社会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是由两方面因素推动与促成的。一方面的因素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观念与方法渐渐占据主流位置。这种新观念与新方法主要是将研究与思考的对象投射到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上，走出传统的理性主义，重视经验与实证。另一方面的因素是社会发展中的剧变，工业革命导致农业社会结构的解体，原有的社会秩序被破坏，种种社会问题骤然出现。它要求思想家们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加以描述、解释、预测与控制。

本来社会学这一名称最早已被亚里士多德使用过，但他讲的社会学是带有哲学印记的社会历史理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使用过“社会物理学”的术语。圣西门则使用了“社会生理学”的概念。这说明，在 19 世纪初，思想家们已经差不多接近一门新的知识领域了，只是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来概括这一领域。

孔德对科学的发展作了分析，提出实证科学是工业革命

时期的科学阶段，并以自然科学的目光看待社会的研究。最初，他也选择了“社会物理学”的名词。但是，这一概念后来却被比利时的数理学家奎得烈所侵占。因为他常用这一名词来称呼他著名的社会道德现象统计，人们久而久之就把“社会物理学”与这类统计等同起来。后来，孔德不得不在1839年，从拉丁文与希腊文中，创造出“社会学”这一概念。

孔德规定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精神。他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精神，去寻求社会变化的法则。他还明确地提出社会学研究的实践目的。他认为应当客观地观察社会事实，观察的目的是为了预测，而预测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

社会学在19世纪30年代形成以后，迅速在欧洲与北美获得发展。在法国除孔德之外，涂尔干研究了“社会分工”以及“自杀”等问题，并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了规定。涂尔干还培养出大批后继者，比如莫斯（Marcel Mauss）、希米安（Francois Simiand）和戴卫（George Davy），后者曾研究过“政治社会学”。在英国，则有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在70年代后期出版了《社会学原理》。在斯宾塞之后，沃拉斯（Graham Wallas）、布斯（Charles Booth）、哥德（Patrick Geddès）发展出社会调查方法。在德国则出现了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

二、孔德对政治的社会学分析

孔德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的变迁与新旧政治秩序的交替，如何改造社会成为他一生的追求。在他担任圣西门秘书时，就确立了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信念。

1861 年—1854 年，他完成了一套四册的“实证政治学体系”的写作，并将其原理运用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上来。

孔德将社会分成三个层次：个人、家庭与社会。他并未对个人作深入研究。他关心的是家庭与社会。他认为家庭所具有的道德特质和协调功能使它能够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由家庭再组成社会阶层、都市、乡村等类社会组织。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孔德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在他看来，所有社会都是需要政府的，否则便没有社会秩序。

孔德认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建立与自然法则一样，其基本原则是和谐一致。社会的各个部门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各种科学之间、科学与艺术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之间都存在着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又是需要领导的。在中古的欧洲社会中，领导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是军人与罗马天主教士。而在科学的工业社会中，领导人物则由科学家来担当。因此，人类的科学知识的整合与实证哲学的创立和由此引起的改革，皆不是由革命与暴力导致的。

但是，孔德认为当时的社会又的确处在危机之中，因此，要克服现存的社会危机，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唯一的办法是运用社会学这一科学，让人们了解历史的实际过程，提倡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主要包括以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存在的条件，以解剖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组织，以生理学的概念来分析社会运动的法则。[①]

孔德提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分析可以从秩序与进化的两个方面来着手。秩序方面的研究则是社会的静态分析。前者着重对社会体系内各部门的反应和行动法则加以观察调查，

其目的在于描述并评估社会体系各部门的相互关系。这种研究强调的是和谐性、一致性。在静态分析中要特别注意各种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比如，单单研究政治而不去了解社会是不行的，政治与社会是统一的。

孔德对社会加以动态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的过程，他认为若以人口增加、与人类心智成长的相关性来衡量社会发展的话，那么，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两者是同义的。当然，他也指出社会的发展并非是一条直线向前延伸，其中必有曲折、险阻。但孔德在论及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时，似乎在物质与知识之间，更重视知识的作用，甚至指出社会改革实质上是知识改革。

三、斯宾塞对政治的社会学分析

斯宾塞（1820 年—1903 年）是一位英国思想家。他没有受过多少正式的教育，完全靠自己苦学而获得知识。他在铁路公司任过职，也干过土木工程方面的工作。从 1848 年到 1853 年，他在英国当时一份有名的杂志《经济学人》当助理编辑，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名流、学者，也因此关心社会政治问题。

斯宾塞是一位进化论者，他于 1852 年写了著名的论文“发展假设论”，其中所涉及到的物种进化问题比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还要早 7年。斯宾塞认为整个宇宙是基本均衡的。社会、有机体、人的心理的均衡只是宇宙均衡的特例。任何社会进步实际上都是从一个不完全吻合的型态转变为吻合的型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事物的分解与事物的整合相互交替的结合。进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均衡境界的出现。

斯宾塞将其进化论与循环论的观点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分析上，他首先分析家庭制度与家族制度；然后，他分析所谓“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指的是人与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应遵守与使用的标志与典仪的总和；最后，他分析人类的政治制度。

斯宾塞认为在初级人类社会里并不存在政府。因为那时社会中的人很少，家族制度、社会文化以及礼仪制度已足够对人们加以制约了。但是，一旦社会扩大，而又发生冲突与战争时，政府就会出现。由此，他指出政府出现的原因乃是因为由一群人聚集而成的社会，总会制造出集体的与共同的目标，因而就需要有政府这样的组织来统一协调与分配资源。因此，斯宾塞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的要求和实现公众的目的而存在的。政府可以解决私人之间为了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当然，政府也会有利益，为了利益政府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与战争。

斯宾塞指出,虽然各国政府的型态、样式与种类很多,但彼此之间总有一些类似的特质：有一个政府领袖；在领袖之下有一群政府官员；有一群数目相当大的、能听命于政府领袖与官员的群众。包括其中的领袖与官吏，都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并以群众的意愿理想为施政的目标。政府必要时要以武力或暴力来控制那种致使群众分裂的局面，政府也只有得到人们的爱戴，才具有合法性的地位。

斯宾塞并不认为政府一经产生就不会变化，相反，他致力于研究政府变化的原因。他认为政府除了在战争状态下和国家内部紧张的状态下会变化外，政府还具有变化的内在原因，这一原因表现为政府组织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政府

必须是有效率、能干的；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是经过政权的传袭才能合法而稳定。前者的目标在于求变，后者的目标在于求稳。政府为了克服这种目标上的自相矛盾，通常在不同时期内会采取不同的目标。但最后总还是以守成来保持其权力，从而导致人民的不满与抗拒。

斯宾塞提出政府的规模一旦扩大后就会产生内在危机。当领土扩张后，一个领袖就无法处理一切事务，许多事情开始交给官员来办，这样就会造成复杂的官僚组织。而官僚组织中的官员就会借此来建立本人的势力以向领袖挑战。同时政府规模扩大也会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造成社会资源的枯竭，并会引发政治与经济的冲突。

最后，斯宾塞认为中央集权式政府最终会走向“代表式”政府。促进这种走向的因素有七种：长期和平；宗教信仰的消退；人口的疏散式分布；人口中阶级层次分明；对反对势力的长期压制导致革命的出现；资源财富增长，贸易市场扩张 政府对人民平等与自由的要求能作出反应。

四、涂尔干对政治的社会学研究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 年—1917 年)虽是法国人，却是带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贫穷，好学而又有超人的毅力。在 1883 年以前,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只视为是教育学的问题。直至 1886 年,他才觉得许多争论实际上属于孔德所创立的新学科即《社会学》。涂尔干在普法战争后到德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利用星期六上午公开讲演来教授他的社会学观点。他最出名的社会学著作是《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许多人认为，社会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虽是由孔德创立的，但是真正把社会学带进学术殿堂及奠定社会学在学术界的稳定地位的则是涂尔干。

涂尔干对社会政治分析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他的社会分工理论。他从社会秩序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分工的功能、分工的原因以及病态分工的型态。涂尔干研究了社会分工的功能。他认为，人们通常只看到社会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一面，但事实上，社会分工所创造的具有道德效应的“连带责任”则具有更长久更重要的意义。所谓“连带责任”则是指个人之间的依赖性，合作性。社会总是存在连带责任的，不过这种连带责任有两类：一类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同质性的机械式连带责任；另一类是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异质性的有机式连带责任。机械式连带责任以社会来压制个人意志，而有机式连带责任则是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的活动。社会分工产生社会的异质性，从而增加有机式连带责任，促进社会与个人发展。

涂尔干指出分工产生的功能与分工的原因是两码事。不能认为社会分工有其好功能，因而大家喜欢，于是就赞同分工了。社会分工有其原因。他认为社会初期存在由一群家族、亲族所串联起来的社会结构即“局部结构”，它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机械式连带责任。当社会生活扩大范围，城市出现，工艺技术发展，社会中人与人的距离拉长，社会同质性下降。另外，人口的增长、分散，也促进社会异质性加大。

涂尔干将城市的增多、工艺技术的提高，称之为“物质密度”增加，将人口的增长称之为“社会数量”增加。这两个增加，就导致原先的“局部结构”不断消失。一旦“局部结构”这一分工障碍消失了，社会分工就发展起来。另外，涂尔干还认为，传统、遗传成份、殖民地化、自杀等因素也会

影响社会分工。

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虽然是带来一个使社会走向整合的有机式连带责任，但是社会分工有时也会产生不正常的与病态的结果。他列举出三种属于病态的社会分工。一种是“迷乱分工”，由于人们过分特殊化而在整体中迷失方向，无所适从。这主要是指出现工商业危机、劳资纠纷，人们之间反而失去了应有的协调功能。

第二种病态分工是‘强迫性分工”。在分工普遍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才干与职位脱节时，社会就会产生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个人总是争取与自己能力相吻合的职位。但是，有时社会的集团为了壮大力量，硬是将一些职务套在与其才干不相配合的人身上就会出现这类病态分工。

第三种是扩张主义的病态分工。一个社会的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的每个部门都不断地扩张，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所负担的职务与功能。这种扩张，实际上正在造成无谓的浪费。这种过度的部门扩张会阻碍社会的有机整合。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一、现代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分支

正如李普塞与瓦尔多所说，只有到了 20 世纪初，政治学才以现代科学的形态出现。20 世纪初，政治学摆脱了哲学的束缚，成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政治社会学也逐渐从社会学的茂密丛林中发展起来，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政治学的传统形态在德国得到保留与继承。在二次大战

前，德国的一些思想家关心的是国家问题，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学。德国法西斯分子对犹太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的镇压迫使许多政治学家背离德国来到美国，并把政治学带进了这个国家。从 1890 年起，美国的一些大学中就开设政治学，1903 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古德诺(Goodnow)、布莱斯(Brice)、罗维尔（Lowell）与后来当选为总统的威尔逊(Wilson)先后当过主席。到 1914 年，美国很多大学中都建立了政治学系。

50 年代以前，现代政治学的发展都是在轻视理论的倾向下进行的。其原因是当时的美国学术界已被行为主义所垄断。无论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还是经济学，都尊崇行为主义。有人称 50 年代是科学对抗哲学、行为主义对抗传统主义的时代。在这种学术气氛下的政治学只能从事所谓的政治行为的探索。

行为主义只重量的统计而忽略质的分析，常常借用一些专有名词与概念，再借数学的名义，玩弄某些公式，以此来代替严肃的分析、探索。行为主义只讲事实不讲价值，把“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人为地割裂开来，以此来标榜客观、中立。行为主义只忙于搜集资料，而不去分析、评价资料，结果，留给人们的只是一大堆事实材料的堆积。

行为主义的‘科学性’‘中立性’并未推进政治学的发展，相反，它阻碍政治学去从事理论探索和与实际政治生活的联系。50 年代以后，已经变得走火入魔的行为主义终于被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取代。这种后行为主义其实是向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注重理论探索的一种回归。许多曾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浪潮中冲锋陷阵的干将，现在也冷静下来。他们开

始认识到社会政治事实一定要配合理论上的解释，才能使它对社会存在与发展产生实质的意义。没有一套理论与观察、分析的模式，任何事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现象堆砌。

现代政治学的这种发展历程也影响着作为它的一个分支的政治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50 年代以前的政治学家虽然也关注政治生活的社会分析，但由于行为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分析研究不可能系统化、理论化。 50 年代以后，许多著名的政治学家运用“因果理论”将政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一般社会学在克服了行为主义的弊端以后，也向理论化方向发展，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也主动将社会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这两股力量的合流，终于使政治社会学成为正式的学科。

二、现代政治社会学形成的标志

政治社会学的渊源相当久远，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它的某些知识要素就已被思想家们描述出来，在后来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这种知识要素又不断地积淀下来，从而成为政治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中一直起作用的内容。这一过程固然受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所支配，但更主要的是客观的社会政治生活决定了反映这种生活事实的思维与理论。

但是，尽管政治社会学的知识要素在漫长的人类思维历程中不断积累，持续发挥作用，但它却没有能以一种学科的面目独立出来。真正的政治社会学学科只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才在一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努力下被正式创立起来。其建立的标志是伊斯顿关于政治体系的理论的问

世。[②]

伊斯顿（D. Easton）一生的著作很多，涉及到政治体系理论的主要有：《政治体系 政治学现状的探讨》、《政治分析的架构》、《政治生活的体系分析》、《政治体系中的儿童 政治合法性的起源》、《政治理论的类别》、《政治体系分析的研究途径》。在这些著作中，伊斯顿对当代政治社会学提出了革命性主张，其观点主要有：

①他反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而把政治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性价值的权威分配之制定与执行。他强调，政治学的研究，必须特别关注政策、权威和社会三个重要因素。

②他认为政治体系是社会互动中，有关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与执行所构成的行为规则。政治体系与其环境之交流而持续或变迁，来自内外环境的输入，经由政治体系的转换，而作成输出。输出经由反馈再传入政治体系，如此运转不息，使政治体系得以持续。

③关于建立抽象化一般理论的过程，伊斯顿认为在建构体系分析的一般理论之先，必须确立有经验意义的概念，然后再提出参照构架（frame of reference），最后再发展为体系分析的一般理论；它必须包括下列各项：重要政治变项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相关性。

④伊斯顿认为，价值与事实是相对照的，事实是根据理论利益对于真实的特殊安排，因此，价值与事实是紧密相关的。他又认为，价值判断与事实界定，都含有想象知识的成份。事实判断虽然讨论“实然”的问题，价值判断则在于讨论“应然”的哲学思考问题，价值判断往往具有事实的基础。

伊斯顿的这些理论为政治现象的经验研究，提供了一种

抽象的分析架构，带动了 比 较政治学的分析研究。其模式具有动力性的分析功能，完全推翻了传统的静态分析，使传统的政治制度的研究，落实到了政治生活的互动研究上。伊斯顿的体系分析特别强调实质政治生活的分析，使政治学的研究，能够完全摆脱传统政治哲学的阴影，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政治社会学，进入当代科学研究领域。

三、现代政治社会学的特征

现代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具有体系化、模式化与功能化的特征。所谓体系化就是运用横断科学中系统理论的成果，将政治生活分析出若干变量，寻求各个变量的自身规定和相互的关联，并将各种变量纳入动态的系统结构之中。从而以系统与环境的互动、系统内部各结构要素的互动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的运行机制。

所谓模式化，是指政治社会学家运用某些类似的实体、图样、形状来表现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形式化的努力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性的模式，也有非物质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是透过人的理性思维，将原来复杂的、不易把握的实际体系简化为一种保留其逻辑联系的象征性的显见模型。

所谓功能化，是指当代的社会政治学家并不仅仅停留在创造庞大的体系、制造简化的模型之上，而是更关心将理论、模式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结合起来，让理论与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功能。比如伊斯顿在 1965 年就讲过,我的第一本书(指《政治体系》),其目的只在于创造一套足以解释政治的社会原因的一般理论。第二本书（指《政治分析的框架》），其宗旨乃在于界定上述理论的范畴。至于现在的这本书（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